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5 3/8 字数 115,000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1072·41

每册：0.52元

(内部发行)

编辑说明

为了贯彻落实第五届全国政协章程规定的“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工作任务，推动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出版不定期内部刊物《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我市的文史资料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曾征集和撰写了大量资料，后工作中断。一九七四年恢复这项工作，继续进行搜集；同时，在整理过去未刊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综合编写工作。本《选辑》将陆续选刊上述这些稿件。

这里刊出的稿件，大部分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但由于撰写者受经历与认识水平的限制，在观点与事实方面都难免有不妥或谬误之处，在编辑工作上也会存在某些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帮助我们不断地改进工作。

目 录

周学熙与北洋实业	淳 夫 (1)
中外资本合营的耀华玻璃公司	张训坚 郭治平 (29)
中国实业银行兴衰小史	李志道 (54)
天津地毯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芮允之 (64)
正兴德茶庄经营概况	武树滋 鲁 箴 (80)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在河北省反共阴谋的破灭	胡梦华 (89)
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	陈世如 (99)
李纯一生的聚敛	窦守镛 苏雨眉 (113)
天津近代工业的早期概况	徐景星 (124)

周学熙与北洋实业*

淳 夫

周学熙的生平及其与袁世凯的关系——北洋实业的开端：
直隶工艺总局——北洋实业的支柱：启新、滦矿的创办——北
洋实业的高峰：创办华新纱厂、中国实业银行和耀华玻璃公
司——实业总汇处的成立与垮台——资本积累和对工人的残酷
剥削

天津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全国一样，是从清政府官办的、封建性质的军事工业开始的。军事工业的产生，刺激了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为了获得优厚利润，一部分与封建制度有密切联系的大官僚也投资于近代工业。早期官僚资本占了近代工业投资的重要地位，某些封建官僚是构成民族资产阶级前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学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二十世纪初叶，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北洋实业。当时我国称奉天（辽宁）、直隶（河北）、山东等沿海各省为北洋。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兴办学校，开办工厂。这些实业为北洋所办，社会上乃

* 本文系根据天津市政协征集的一些关于周学熙和北洋实业的文史资料 未 刊稿加以整理，并参考一些有关书刊写成。

称之为北洋实业。后来北洋实业发展成为天津当时最大的资本集团，在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中，与江苏南通大财团张謇并列，被人称为“南张北周”。

一、周学熙的生平及其与袁世凯的关系

周学熙（一八六五——一九四七），字缉之，六十岁以后号止庵，安徽至德县人。他的父亲周馥少年时屡试不第，乃投入镇压太平军大刽子手李鸿章的淮军中当幕僚。由于周馥在镇压太平军中效力，深得李鸿章的赏识，在李的提携和推荐下，使他很快由知县、知府、津海关道升为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又一跃为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爬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官僚行列。周馥在两广总督任内，广东流传这样两句民谚：“穷了广东一省，富了周馥一家”。周学熙就是在这样一个反动的封建官僚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周学熙十六岁入泮，廿九岁（光绪十九年）中顺天乡试第十八名举人。后来入京会试不第，乃决定放弃科举道路，捐了个后补道。

周馥和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是儿女亲家，因此张翼于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派周学熙为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售煤处主任。周学熙由于有了后补道这个身份，才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当上了开平的会办，转年升为总办。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周学熙逃往上海。一九〇一年他投奔山东巡抚袁世凯。周学熙之所以投奔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同周馥过去都在李鸿章手下作幕僚，关系很好，后来两家发展成为儿女亲家。周学熙同父异母

的八妹，嫁给袁世凯的八子袁克轸。由于至亲之故，周学熙到了山东之后，袁世凯就委他为山东大学堂督办。这是周学熙同袁世凯共事关系的开始。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冬，袁世凯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继任山东巡抚。周学熙因其父当了他的顶头上司，按照清朝的惯例必须回避，所以周学熙又到天津当后补道。一九〇二年袁世凯为了铸造银元增加财政收入，委任周总办银元局。由于当时市面流通的制钱极度缺乏，形成钱荒，公私极感不便，因此袁世凯让他设法尽快地把造币厂建立起来，先鼓铸铜元以供应市场需要。当时银元局既无地址又无机器，周学熙择定河北大悲院烬余故址，使用东局子修械厂被八国联军破坏的旧机器，召集机匠日夜赶造，仅仅七十天的时间就开工鼓铸了铜元。袁世凯看到周学熙在两个多月时间就能开工生产，认为周学熙有经营企业的才干，就委派周学熙给他主持北洋实业。周感知遇之恩，因愿为袁效力。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三月，袁世凯派周学熙到日本去考察工商业。周在日本虽只短短三个月，但给他的影响非常之大。他认为日本的富强是由于搞“练兵、兴学、制造”三事，中国如要富强也必须从军事、教育、经济三方面效法日本，走明治维新的道路。

周学熙从日本考察回来后，袁世凯就委派他总办直隶工艺总局。袁世凯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靠政治投机起家。早在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维新运动时，就由于他出卖了维新派受到慈禧的赏识，从而为他爬上封疆大吏的地位铺平了道路。在袁世凯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清政府的政权因遭到八国联军的侵略而危如垒卵。为了保住政权，慈禧于一九〇一年初

（光绪二十六年底）等不及回到北京就在西安匆忙地颁诏变法（见《清史稿》德宗本纪）。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五年，几年之间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所谓“新政”，一方面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设立商部、颁布提倡和保护民族工业的一些条例，以缓和阶级矛盾；一方面练兵筹饷以镇压人民革命。袁世凯就抓住这个机会，一面练新军，到一九〇五年达六镇之多，成为当时封建势力的主要支柱；一面用周学熙总办直隶工艺总局，以搞“新政”为标榜，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办法，兴办学校，开办工厂，并推动直隶各府厅州县兴工艺、开工厂。一时大兴工艺蔚然成风，直隶省成为全国搞新政最活跃的省，社会上称之为北洋实业。北洋实业即以直隶工艺总局为开端。

周学熙在直隶工艺总局先后五年。在此期间，周经袁世凯的提拔和推荐由候补道升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但始终继续担任工艺总局职务，直到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冬因丁母忧而离任。

在周学熙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督办期间，他除了总办银元局、官银号外，还奉袁世凯命负责交涉收回开平矿务事宜。由于英帝国主义依仗强权加以阻挠，使交涉没有进展。因此周学熙通过交涉先将开平霸占的唐山细棉土厂接办过来，招股成立启新洋灰公司，随后又创办滦州矿务公司，企图“以滦制开”，达到收回开平的目的。但是最后由于抵不住英国帝国主义跌价倾销政策的压力，为了追求利润，同意和开平联合经营，成立开滦矿务局，由“以滦制开”一变而为“以开合滦”。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初，清政府因消防需要拟在北京安装自来水，经袁世凯推荐，召周学熙入京，授以农工商部丞参上行走，命其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周率人查看水源

后，即招商股三百万元，股息八厘，由政府保息三年，建厂于东直门外，期年而工成。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当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一上台就积极准备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军事镇压。为了筹备军费，命财政总长熊希龄向英、美、德、法、日、俄六国银行团接洽借款，总额六万万两，不顾丧权辱国，条件规定以中国盐税收入作为抵押。当时大借款的消息逐渐泄露，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财政总长熊希龄不得不辞职，使借款之议暂时停顿。袁世凯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遂提拔周学熙为财政总长。

周学熙为了报效袁世凯，接任后，一面为袁世凯整理税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在各省建立国税厅，又计划设印花税、所得税、遗产税，以进一步搜刮人民财富，又计划办理云南铜矿，延长石油、汉河金矿以及纺织工厂，以进一步开辟利源；一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伙同当时的总理赵秉钧、外长陆征祥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秘密在北京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一项英金二千五百万镑的所谓“善后借款”合同。这项借款年息五厘，四十七年还清，以盐税收入作为抵押，规定在财政部下设盐务署，由外国人“襄办”盐务以保证盐税收入，偿还借款本息。从此，中国盐政和海关一样，完全沦于帝国主义之手，盐务机关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政府的工具，使中国人民被剥削压榨长达数十年之久。这项“善后借款”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反对，周学熙被迫于签订合同后不久即行辞职。袁世凯由于得到这笔借款，缓和了他的财政困境，从而加强了反动统治，终于把“二次革命”镇压下去。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十月，袁世凯由临时大总统被选为正式大总统。但他还想当皇帝。为了筹划帝制活动的经费，一九一五年一月，袁世凯二次任命周学熙为财政总长。周就任后即着手整理田赋，整顿盐产，清理官产，施行烟酒公卖，为袁开辟财源。这些措施都是直接间接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和掠夺。此外，还以筹划全国的经济建设为名，如筹办实业银行和兴办工业，为巩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周学熙对袁世凯搞帝制活动并不赞成，因为他知道搞帝制不得人心，必致失败。袁世凯对此甚为震怒，将周学熙软禁起来，直到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才恢复自由。

在周学熙第二次当财政总长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机会，特别是洋纱因进口锐减，价格倍增，纱厂利润高涨。周学熙见办纱厂有利可图，遂授意其亲信具呈袁世凯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由财政部拨款先在天津建厂，订购纺织机器。正进行间袁世凯搞帝制失败不久死去，周学熙也辞去了财政总长，因而财政部即未再拨款。华新公司后又集资陆续创建了青岛、唐山、卫辉等三个纱厂。

一九一九年，总统徐世昌委周为全国整理棉业筹备处督办。周就任后拟办一模范纱厂，因资金短绌未能实现。为了给棉业培养技术人才，设棉业传习所，其毕业生多派充为华新纱厂技术干部。此外，为了增加棉花产量，改进棉花质量，减少进口棉花，棉业筹备处引进美棉种籽十余万斤在河北、山东、河南一些产棉县份试种。周学熙还成立长芦棉垦局，拟仿效张謇开垦苏北盐场种植棉花办法，在长芦五场废地进行开垦。由

于徐世昌不久下台，周亦随之离任，此项计划未能实现。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周学熙集资开办普育公司（机器制造厂）、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华新银行、久安信托公司等企业。

一九二四年周学熙六十岁，辞去了滦矿主任董事、启新总理、华新唐卫厂管理处主任、京师自来水公司总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理等职务，组织了实业总汇处，自任理事长以控制各企业。由于各企业的负责人各自为政，周实际不能控制，一年后即辞职，把实业总汇处改组为实业协会。又二年改为实业学会，周即引退家中以诗文自娱，不再过问各企业的业务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周学熙年八十二岁，卒于北平寓所。

二、北洋实业的开端——直隶工艺总局

1. 开办直隶工艺总局的起源

天津遭到八国联军的侵略后，地方的建设和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一时无业“游民”甚多。袁世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以巩固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札委周学熙总办教养局以收养“游民”，同时他为了迎合清政府推行办学校、开工厂等等所谓“新政”，把刚刚开办不久为了培养工艺人才的工艺学堂拨归教养局兼管，并要该局筹办鼓舞市情的考工厂。周学熙认为“教养局系收养‘无业游民’，办法宜仿营伍，以约束严整为主；工艺学堂系造就人才，办法宜仿义塾，以培养诱掖为主；考工厂系鼓舞市情，办法宜仿赛会，以交通联络为

主。此三事情形各有不同”。^①所以他接到这个扎委后，向袁世凯建议把收养游民的教养局交给地方去办，另行成立直隶工艺总局。在成立之初“先办学堂及考工二事，以学堂习其技能，以考工生其观感”，^②“并考求直隶全省土产及进口所销各货，凡是可以仿造的，加以提倡和保护，使之尽利。”^③周学熙认为照此办理，“将来工场遍立，制造日精，自然户鲜游闲，民多乐利，不特隐患可消，且以立富强之根本矣”。^④周学熙这个建议既可以为袁世凯捞取政治资本，又可以使游民就业“隐患可消”，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这当然正合袁世凯之意，所以深为袁世凯所赞许，就委派周学熙总办直隶工艺总局。北洋实业即由此开端。

2. 直隶工艺总局概况

周学熙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他计划通过该局仿效明治维新兴学校、办工厂的办法来实现他的大兴工艺的想法。他认为“工非学不兴”，可是如果风气不开，工业也发展不起来。所以他在办工艺学堂的同时，筹办了考工厂，用工艺学堂来培养工艺人才，用考工厂来开通风气，劝导“绅商”投资工业。

周学熙办工艺学堂（后来改名高等工业学堂）时，特别注重理化与机器制造。为了使学通过实习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一九〇四年开办了实习工场。该场除供工艺学堂学生试验制造外，还招收工徒实地练习。

① 见《直隶工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六页。

② 见《直隶工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八页。

③ 见《直隶工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七页。

④ 见《直隶工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下第二十二页。

考工厂开办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八月，一九〇六年十二月改名为劝工陈列所。周学熙在筹办考工厂时，“均采日本成法”，同时又“参以本省现情”，除购置本省、外省和外洋的常用、稀用各物品陈列起来任人参观以开风气外，并附设工业售品所，出售工艺总局所属各工厂的产品。为劝导“绅商”投资工业，开办工商演说会，每月两次，“以增益其见闻”；又设工商研究所“以开拓其智识”。为了激励工厂提高质量，订立考工制度，举行招考，分别奖励，“或给金银牌，或稟准专利以资提倡”。

周学熙一面通过考工厂来劝导和鼓励“绅商”投资开办工厂，一面由直隶工艺总局投资开办造纸工厂以为示范，又以官督商办形式开办劝业铁工厂和官助商办形式开办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等。

为了推动直隶全省发展工艺，直隶工艺总局行文各府州县厅要它们也成立工艺局，同时还“委派劝工员赴各处考察情形，开会演说，其风气未开者，多方利导，其成本未裕者，酌助赀财”。^①但是当时直隶一省一百六十几个府州县厅直到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才只有六十五处成立了工艺局（或工艺学堂、工艺所、工艺厂）。这是因为清政府的官吏贪污腐化，只知残酷压榨劳动人民血汗，对于既无经费又无好处的工艺局的成立，当然不感兴趣，所以将近一百个州县没有成立工艺局，而已成立的州县也不过是官样文章，徒具虚名，在周学熙一九〇七年因丁母忧离职后就相继停办了。

3. “大兴工艺”以失败告终

^① 见《直隶工艺志初编》志表类卷下第二十七页。

直隶工艺局通过高等工业学堂培养出来化学和机器制造的技师一百五十三人，通过实习工厂培养出来织科、染科、胰皂科、窑科、燧科（即火柴科）工徒七百余人，培植了一些技术人才。又通过劝工陈列所以及该所附设的工商研究所和工商演说会，在开通风气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周学熙主观追求的“大兴工艺”却以失败而告终。周学熙要求的大兴工艺的实质，就是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把中国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的，“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周学熙兴办工艺总局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双重压力下，尽管清政府颁布一些规章，奖励资本家兴办实业，实际在经济上没有给什么资助，捐税上没有什么减免，运输上也没有什么照顾。所以除了一些大官僚、大买办投资的厂矿由于利用封建势力和特权并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才能得到一些发展外，一般中小户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因此大兴工艺不过是昙花一现。例如有些州县搞了一些工业，但多数是手工业生产，以织土布较为普遍。但即使一时比较畅销的高阳土布也未能逃脱被洋布挤垮的厄运，其他土布就更不用说了。静海县的工艺局仿造出来日本中桐式铁轮布机，因成本高难销售，只好停产。它又仿造日本纺纱机器，又以出布不匀，而改制木轮织布机。这说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企业，由于技术低劣成本高昂，根本无法与洋货竞争，更抵挡不住洋货的倾销，这就是工艺总局未能使工艺大兴的主要原因。

三、北洋实业的支柱——启新、滦矿的创办

周学熙于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先后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公司。这两个公司是周学熙搞北洋实业最早的近代化企业。启新从开办后一直有高额利润，滦矿在与开平联合后，更获得超额利润。后来周学熙创办的企业，其中有一些是在启新、滦矿的支持和投资下办起来的。启新和滦矿成为北洋实业的两大支柱。

1. 启新洋灰公司的创办

①收回唐山细棉土厂

唐山细棉土厂建于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由于军工和铁路对水泥需要日增，当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唐廷枢见水泥工业有利可图，乃集合官商股本十万两开办该厂。因经营不善，不久即将股本蚀尽，还拖欠开平银十万余两。一八九二年唐廷枢病故，张翼继任督办，将该厂停办。

一九〇〇年春，开平总办周学熙见水泥销路甚广，即着手筹备恢复唐山细棉土厂。正在筹办期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开平督办张翼将开平盗卖与英国人，并将细棉土厂作为开平垫款的抵押品与开平一并为英帝国主义侵占。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周学熙奉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命负责办理收回开平产权的交涉。周学熙鉴于交涉工作十分棘手，一时难于收回，为了使工作得有进展，他建议袁世凯先交涉收回细棉土厂，因为他知道该厂与开平并不是一个单位，该厂与开平有约，三个月前通知开平，即可收回自办。因此这项交涉比较容易进行，而且他认为该厂产品销路甚好，收回后加

以扩充必将有利可图。袁世凯同意这个建议，几经交涉终于将该厂收回。收回后，周学熙别有用心地对唐山细棉土厂的资产估值尽量压低，该厂机器还能生产，即以“业经腐败”为由而“毋庸计价”，因而他以极少的代价收买了该厂全部资产。

②利用公款办私人企业

收回唐山细棉土厂后，周学熙计划集资一百万元，分坐本（固定资本）与行本（流动资本）各五十万元，在商股募集前，先由国库垫款。袁世凯批准这个计划，并分别饬令淮军银钱所和天津官银号各拨五十万元。淮军银钱所后来实际贷给四十万两，契约规定期限十年，年息五厘，前三年只付息，不还本，从第四年起，每年付息一次，并还本银六万两，至第十年本息还清。当时市场借款利息为月息八厘至一分二厘，年息五厘只合月息四厘多一点。这种优厚条件是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用其特殊势力所取得的。

这项借款由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到翌年七月仅仅用了八个月就因募足商股而还清。这样优厚条件的利息为什么不到期就还清？因为启新从开始生产起就获得厚利，所以招股非常容易。商股招齐后，就有袁世凯内调外务部尚书的传说。周学熙认为如果袁离开天津，启新倘不将借款还清，这样有利可图的厂子难免因遭觊觎而发生问题，所以他宁可放弃低息的借款，而不愿冒因官场变化而发生的风险。

③依仗特权获得厚利

启新自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开办到一九一二年底，六年间共盈利一百五十八万九千二百余元，股东分得股息和红利累计为百分之九十八，亦即基本上将原投资金额收了回来，利润可谓优厚。在这六年间，由原来的甲厂扩充为甲乙两厂，生产能力

由每日七百桶增至一千二百桶。其所以有这样快的发展，是由于依仗封建势力取得种种特权。

启新成立之后，在直隶、东北以及长江流域取得优先设立分厂的特权。在销售上，清政府的农工商部和民国初年的交通部都曾饬令京奉、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等铁路局与启新订立水泥专用合同，并规定其他公司不得援以为例。在税捐上，清政府批准启新水泥及其他制品“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税一道，值百抽五，沿途概免重征”。入民国后此案仍然有效。在用煤上，启新与滦矿订有互惠合同，价格不得超过开平市价十分之七。在运输上启新与各铁路局及招商局均订有减收运费合同，一般按七八折收费。制造水泥主要是石料，价格甚廉，其成本中占比重最大的却是燃料费与运输费。启新在这两方面都具有特权，成本甚低，而在销路上又垄断了市场，所以启新从一开始就获得高额利润。

④资本家争权夺利，周学熙被迫辞去总经理职务

启新大股东，主要分为两个派系，争夺董事部和总事务所的总理、协理的位置和大权。一派是以周学熙为中心的安徽系，一派是以袁世凯家族为中心的河南系，另外还有拥有实力后来倒向河南系的李希明一系。他们彼此之间原来非亲即友，但在权与利的面前，却争得不可开交。

安徽系的主要成员在家族方面有周的九弟周学煊、侄周叔弢、婿张邠野和胡光镗，在亲信方面有最早的坐办、后来担任过总理的陈一甫和初期的协理孙多森及其弟孙稚筠、孙章甫。

河南系初期以袁世凯的亲信、袁克定的把兄弟、协理王锡彤为中心。王死后其子仲刘掌握实权。袁世凯的家族方面有袁的六子袁心武、八子袁凤镗、九子袁铸厚。大股东卢木斋本不